

編者按

今年是文革爆發四十周年，關於這場並不很久遠的歷史，早已有種種敘述，毫無疑問，這些敘述仍將延續下去。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樊星的文章通過對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些作品的解讀，指出這些作品豐富了我們時代的「文革」記憶，也深化了我們對於「文革」的反思。董國強的文章則是對大陸學界紅衛兵運動研究的綜述，認為大陸學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現有的實證研究在地域分布上和年齡層次上還過於單一，有待進一步拓展範圍。高華細緻剖析劉少奇指導的貴州「四清運動」，「既有毛氏特色，也帶有頗為濃厚的斯大林色彩」，有如一場新的「肅反運動」。這樣，就不能把文革起因僅僅看作是毛的極左路線。裴毅然的文章細緻生動地呈現出文革中知識份子的悲慘遭遇。

「政治與法律」欄目，吳稼祥的文章認為權威落差是千百年來中國王朝政治穩定的前提條件，並探討了權威落差與政體模式的關係。鍾兆雲的文章認為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在台灣強行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遺患匪淺，在今天反獨促統之路上，台灣社會殘存的「皇民化心態」和「皇民情結」是必須正視並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

「人文天地」欄目，趙泓的文章描述了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要社團少年中國學會的活動及其烏托邦理想。「批評與回應」欄目，鍾波的文章批評大陸出版的《中國通史》、《中華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等著作竟然以小說為藍本篡改歷史。「書評」欄目，吳國坤的文章是對美國學者傅葆石的著作《上海與香港之間：中國電影的政治》的述評；張慧敏的文章是對王斑的著作《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的長篇評論。